

古典民主理想的复兴及其困境^{*}

——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

陈炳辉¹ 李鹏²

(1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厦门 361005)

摘要: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卡罗尔·佩特曼提出了旨在复兴古典民主理想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她主张扩大参与,强调参与式民主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展,以实现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参与性社会。然而,这些主张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面临着不少困难。

关键词:佩特曼;民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式民主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2-0070-07

“参与”和“民主”历来就是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民主从维护个人自由的立场出发,把参与限定在选举的范围内,把民主仅仅看作是选举决策者的方法;既限制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力,又扩大了潜在的不平等,并最终降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活力,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危机面前无能为力。为了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端,卡罗尔·佩特曼于1970年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标志着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正式出现。该书曾在美国出版20余次,影响十分深远,当今蓬勃发展的强势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都被看作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发展。佩特曼对参与式民主的贡献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她曾担任过澳大利亚政治学会主席,并于1991-1994年担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职务,成为该学会自成立以来第一位女性主席。

一、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逐步勃兴并发展成为当

今世界的主流。从本源上讲,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人自由,但是,公民社会的日渐发展,使自由主义在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平等诉求。于是个人权利逐渐以宪法、公约的形式被肯定,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以选举权的形式与公民资格相统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试图容纳并改造了传统的民主观念,公民的选举权在代议制度的框架内不仅保护了个人自由的优先性不受侵犯,同时,又从形式上实现了人人平等。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造,自由主义的民主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余年里,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很大程度的繁荣与进步,“福利国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欧各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崛起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实施了普遍的社会改良和经济改革,实现了大多数人向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化。这些国家的政治氛围是普遍宽松的,阶

*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项目“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编号07JA810014)的部分成果。

级斗争趋向缓和,一些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令人惊叹。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西方社会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并存。不满现状的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民主参与运动。“新左派”运动乘势而起,推动了6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社会民众运动的高涨。在这一抗议运动中,人们提出了众多与民主相关的要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围绕着人民提出的种种要求扩大了民主的概念。因此,只有当激进的民主观能够指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经围绕着民主的种种要求扩大了民主的概念时,激进的民主观便在思想史上处于优势……核心概念的平等和人民主权原则包括在民主的概念之中。”这些激进的民主观念与激烈的民权运动和校园运动相结合,黑人和妇女们要求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白领工人们要求工会组织化以弱化因权力过剩和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形成的极端不平等。知识分子和有关群体声称他们已经厌恶了物质主义和无效率,厌恶民主政府依附于“垄断资本主义”,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厌恶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反文化”倾向,并对学生、媒介和一般公众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指责自由主义政府对民权运动和自由言论运动中的民主目标的态度是伪善的。自由主义政府及其民主承诺逐渐失去社会信任。大学校园中年轻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各种马拉松式的讨论,他们通常以“你听到什么消息了?”作为相互见面的问候语,相当多的信息通过这些口耳相传的渠道来交流,以致于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在获得受众的功能方面显得毫无用处。他们总是掌握着比收音机、电视或报纸所能传播的更多的关于政治形势的信息,共同经历的希望、信任、社群和行动的感觉不仅使人们接受了一次良好的政治教育,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亲自参与政治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全然不同于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境遇。总之,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战后经济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从物质主义的、着重工作的和热心公益的价值观念向重视个人满足、闲暇以及‘物质的、知识的和审美的自我完善’的需要

的价值观念的转化……这些价值观念经常是与对政治领袖和制度的更强烈怀疑主义并存的”。在中学和大学教育向一般民众扩展的过程中,具有上述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对民众参与政治的要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参与”和“民主”——古典民主的参与理想

在对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规模民众参与运动的考察过程中,佩特曼发现,随着参与要求的扩张,参与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词汇,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广为流行的参与思想在政治理论家和政治社会学家所普遍接受的民主理论(如此普遍以致于可以称为正统学说)中却只具有最为低微的地位。”在佩特曼看来,民众爆炸性的参与期望和自由主义民主对参与的漠视“构成了政治理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代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地位。”

自由主义民主为何如此漠视参与?佩特曼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使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们普遍相信他们对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主的怀疑是证据确凿的。政治社会学家们通过大规模的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公民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公民缺乏对政治的兴趣。不仅如此,调查还发现在这些国家普遍流行非民主或权威主义的政治。于是,这些政治社会学家得出结论:古典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形象令人绝望。同时,作为政治态度调查的副产品,他们认为当前政治生活中政治冷漠者的广泛参与会危害民主制度的稳定。其次,佩特曼指出,二战前后极权国家的兴起及其危害使民主理论家对参与的强调备受非议。二战前的魏玛共和国拥有高度的大众参与却演变成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极权国家”也拥有高度的大众参与,但这种参与却是建立在恐吓和强制的基础之上的。佩特曼认为这种并不合理的联系使人们相信参与是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和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许多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人民统治意义上的民主的可能性。佩特曼认为莫斯卡、米切尔斯等

早期的精英理论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米切尔斯在调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实践活动以后提出了著名的“寡头政治铁律”,认为精英现象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莫斯卡则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可以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是由精英主导的。在后期的著作中,莫斯卡还把自己的精英理论和代议制度结合起来考虑,而这些早期精英理论家的许多观点都被当代民主理论借鉴和吸收。另外,佩特曼还指出导致人们拒绝接受早期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的参与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就热衷于所谓“科学化”的运动,直到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这种取向依然有增无减。它排斥规范的、价值判断的理论,主张政治理论应该是建立在政治生活事实基础上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理论。

佩特曼认为,这些趋势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自由民主理论家,致使他们质疑“古典民主理论”中参与理想的现实性,将其称为民主的“古典神话”,并据此“合理地”对古典民主观念进行系统地改造。这些特征构成了近年来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在自由主义民主看来,民主仅仅是“指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者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特征因素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选票。对民主方法而言选举是关键性的。因为大多数人能够通过选举来控制他们的领导者。领导者对非精英的大众要求作出的反应,或者对领导者的‘控制’,主要通过选举活动中领导者因担心失去职位的惩罚而予以确保。在选举活动的间隔期,领导者的决策由于积极团体的施压而受到影响。民主理论中的‘平等’是指平等的选举权,以及对领导者施加影响的机会平等。……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指人民广泛参与对决策者的选择。因此,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唯一功能就是起保护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的影响,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

在佩特曼看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已经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去甚远。首先,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误解了古典民主理论,古典民主理论主要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非描述性的理论,它所提供

的主要是一种“处方”式的功能。所以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应该以其描述性或者实证性的诉求来指责古典民主理论的规范性。其次,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科学的和价值中立的,因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论在对古典民主进行修正的过程中已经用自己的理想取代了古典民主的理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民主的规范意义。因此,准确地讲,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只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西方人当下生活于其中的所谓“民主”体系而已。相反,佩特曼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者们实际上已经就古典民主的理想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所有人最大限度地参与是民主的核心,同时,通过参与来逐步培养理性、积极和富有知识的民主人是民主的归宿。

三、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参与式民主的扩展

围绕着自由主义和古典民主理论在“民主”观念上的差异,佩特曼以“参与”概念为核心,建构出了旨在复兴古典民主理想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她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参与的教育功能和工业领域的关键地位。”

首先,就参与的教育功能来讲,佩特曼认为个人的参与越深入,他们就越具有参与能力。具体而言,个人只有在实际的参与活动中才能形成民主所需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以及程序知识的获得等等。除此之外,参与还具有整合性功能,有助于人们接受集体决策。在佩特曼看来,参与所具有的这些教育功能使参与性制度具备了自我维持的功能,因而自动排除了自由主义民主借口政治稳定对“参与”所做的制度性限制,进而为参与式民主扩大民主参与的主张提供了依据。在佩特曼看来,“参与民主理论可以和当代民主理论在每个实质性的方面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民主’的特点、‘政治’的定义(详见表1所示)。参与式民主理论中的‘政治’不仅仅限制于通常所指的全国性政府或地方政府,”还包括整个非政府的权威结构。“在参与民主理论中,‘参与’又一次指在决策过程中的(平

等)参加,‘政治平等’指在决策方面的权利平等。”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民主体系主要依靠参与过程中逐渐集聚的人性来维持。如果要描述参与的模式,佩特曼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最大程度的输入(参与),而输出不仅包括政策(决定),也包括每个人的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发展,因此存在着从输出到输入的‘反馈’”^⑩。

表1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比较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参与式民主理论
政治	政治是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	政治不只是限于通常所指的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还包括工业领域、甚至家庭学校等领域中与相应的权威结构有关的活动。
参与	参与是指人民参加选举活动或广泛参加对决策者的选择。参与的唯一功能是保护性功能。参与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过度参与会危害政治体系的稳定。	参与指在个人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参加。即个人通过民主程序在不同层次进行管理。参与最重要的功能是教育功能,个人参与活动越多,就越具有参与能力。
民主	民主是一种为达成立法或行政方面的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政治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获得作出决策的权力。	民主是为达成实现共同善的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通过个人集合起来执行人民意志的选举活动使人民自己能够决定问题。它强调个人亲自参与决策的重要性,强调把决策分散到较小的团体中的重要性,强调增加参与地区和地方政府的决策的机会。

资料来源:[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40页。

其次,就工业领域的关键地位来看,佩特曼认为,只有把个人与他们所处的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参与式民主才能够完全建构起来。而这最终需要一个参与性社会——一个完全民主化的社会来支撑。因为只有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中,“个人才能更好地评价国会议员的行为;如果有机会,他将更有能力做出全国性的决策,也更有能力评价国会议员在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事务方面所做出决策的效果;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中,个人投票的意义将有所不同,作为私人个体,他将享有各种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⑪在佩特曼看来,只有一个社会中,所有领域的政治体系通过参与过程实现民主化和社会化,才能为一个参与性的社会提供机会和条件。正因为如此,

参与式民主才把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看作是参与性社会最重要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当今工业经济系统不论在组织形态上还是在功能上,已经表现出越来越类似于政治系统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人来讲,一个人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中度过的。该领域提供的教育个人管理集体事务的功能,是其它领域无法提供的。因为:第一,工业领域提供了国家政治以外参与的领域。第二,工业领域中的参与使“管理者”和“工人”间的固定差异开始发生变化,至少是修正了工业领域的权威结构,而这一进程为实现实质性的经济平等、保障个人平等独立地参与提供了条件。因此,佩特曼强调,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经济领域的权威结构必须实现民主化,这就要求参与式民主必须由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展到工业经济领域中去。

为了检验上述两个假设,防止参与式民主滑向乌托邦式的幻想,佩特曼认为必须在实践领域中检验工作场所与工业领域中参与实践对民主的实际意义。首先,佩特曼引用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并通过伊斯顿、阿尔蒙德、维巴、布劳纳和布鲁姆伯格等人的实证研究成果说明了工作场所和生活领域中的参与行为有助于增加个人的政治效能感——即民主行动的心理动力。其次,佩特曼认为,工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系统,如果能够证明工业领域中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工业领域的民主,那么,参与行动将推动民主从工业领域向更大范围的扩展。而英国一个拥有20名雇员的小规模企业——格拉斯哥的罗文工程有限公司“几乎完全对应于我们所指的高层次充分参与的模式。”^⑫在这个企业,工厂管理机构是总委员会,委员由工厂中工作满3个月以上的工人组成,他们一人一票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每位成员主持两届会议。会议的议程和内容提前两周公布,涉及选举董事、工厂经理、工头,评议公司的生产报告、销售报告、财务报告以及决定所有其他的政策问题和事务。这个实例的发现,使佩特曼坚信工业企业的参与式民主是可能的。最后,南斯拉夫工人自我管理制度的实践为佩特曼探讨大规模的工业领域中能否直接移植参与式民主提供了一些思

路:首先,管理组织中的管理人员的频繁轮换意味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至少应当有一次机会。其次,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管理制度通过对企业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投票的方式提供给每一位工人参与决策的机会。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分析使佩特曼相信“参与式民主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参与性社会,这一要求并不是不现实的。”^[14]

四、佩特曼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价值

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她重新界定了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分析了自由主义民主对古典民主的误解,客观地指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可以说,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不仅丰富了民主理论,也丰富了民主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合理因素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首先,佩特曼指出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缺陷。在佩特曼看来,熊彼特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开创者,他对民主概念的界定是我们了解自由主义民主的关键。在熊彼特眼中,古典的人民统治的理想在早期民主理论家关于民主的观点中占据核心地位,而这种规范性的理解已经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相差甚远,所以对古典民主概念的修正正是必要的。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者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5]，“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16]因此民主的概念也就被“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替换为“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从这一定义出发,熊彼特以及此后的许多当代民主理论家都试图从现实的经验材料中寻找一种建构民主理论的方法以解释实际运行中的民主现象,他们标榜“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主张排除民主理论中一些无法界定的规范性概念。然而,在佩特曼看来,自由主义民主在口头上宣称价值无涉,但实际上却把英美政治制度当作是民主理想。于是,自熊彼特以后,民主成为一种与任何特定的理念

或目的没有关系的理论,古典民主的参与理想被排除了^[17]，“民主的核心成为少数领导者”^[18]，“大多数公民的冷漠和不感兴趣对于维持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被认为是必要的”^[19]，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活动,民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和普通个人的政治品质相关。在佩特曼看来,这种理论路径导致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总体上成为一种悖论——它在许多方面与上个世纪的反民主观点颇为相似,然而它却一直被冠名为一种“民主”理论。

其次,佩特曼还指出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实践领域造成的危害。综观《参与和民主理论》,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压制了个人自由,尤其是在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工业企业对个人消极服从必要性的强调,严重地扼杀了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实践造成了政治生活中普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还包括性别、种族、信息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第三,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实践领域过多地关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建设,忽略了对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以及相应条件的建设,导致宏观民主和微观民主失衡,引发了6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危机。

第三,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了参与在民主理论中的地位。在民主理想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参与和民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古希腊自不必说,它是直接参与民主理想在实践领域的最佳范型。16、17世纪以来,近代民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不管是从封建主义或绝对主义转变为代议制民主,还是从有限选举制演进为普选制,亦或是公民权利在内容和范围上的扩大,都无不以政治参与的扩大为内涵。但是这种以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由于其激进的特点而被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置之一旁。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民主出现危机以后,参与式民主理论才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1970年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出现。佩特曼系统地阐述了参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卢梭、

密尔、科尔等早期民主理论家的观点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按照卢梭等人的观点,佩特曼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直接的、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到政策执行都应该有参与,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前提下,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人间平等和自由等才有可能实现。在佩特曼提出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后,两位著名理论家——麦克福森和巴伯继续就佩特曼的理论展开探讨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有关参与式民主的思想成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佩特曼的理论还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积极回应。参与式民主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重要发展是协商民主理论,该理论被看作是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分析这些理论及其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佩特曼及其《参与和民主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五、佩特曼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困境

分析佩特曼参与式民主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主张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一些批评者对于其理论局限性的质疑和分析是深刻的,其中不乏言语中的之处,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参与万能论的倾向,她过高地估计了民主理性,忽视了夸大参与功能可能带来的弊端。许多学者指出,尽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我们是通过参与而学会参与的,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参与确实有助于培养那种积极的、有知识的公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参与的发展将引起人的发展的复兴。所以,对于“参与”价值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而且,强调参与不能仅仅以培养积极公民为依据,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参与过度可能带来的危害。赫尔德就指出,“(佩特曼)忽略了由于她的参与模式的应用而导致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恶化,这些人可能做何种反应,以及他们应当被怎么样对待的问题。”^[20]而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中对工业领域高层次参与的实际调查本身就反映出,个人(工人)对较高层次的参与普遍缺乏热情。而这一点已经被公共选择理论用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个人在参与问题上理性而又无知的,因为他们会考虑参与活动

的成本和收益,当参与成本大于参与所获得的收益时,就算是有再多参与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去参与。另一方面,近代社会以来一项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脱离政治的自由”,这一自由也是当代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完全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广泛的参与是不必要的,持这种看法的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就是他们确信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民主自治的法律体系表明参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过程并不是由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公民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所以,参与很难被确定为基于公民权利的一项公民义务。这正如赫尔德所指出的:“佩特曼倾向于假设人们普遍想要扩大对其生活的控制范围,但如果他们不想这么做又能怎样呢?如果他们不想成为民主理性的奴隶呢?或者如果他们‘不民主地’运用民主权力——即限制或终止民主呢?”^[21]显然,如果无视这些情况而盲目扩大并推进参与进程,将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这正如胡伟所说:“(佩特曼)将参与民主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万能良方,回避了历史上曾经屡次出现的‘多数人暴政’以及极权主义导致的全民参与的全能政治。”^[22]

其次,许多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质疑佩特曼参与式民主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佩特曼对一些根本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解释这些问题,对于了解佩特曼参与式民主运行的可能性来讲是必需的:比如经济活动应当如何组织;是否应当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参与式民主的实施离不开代议制,但是参与式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代议制的不足,在什么层次上弥补;如果工业领域的权威结构能够民主化,这是否意味着需要改变所有权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参与式民主必须回答的问题。赫尔德指出,由于“佩特曼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所谈甚少,……这使她易于受到批评。”^[23]第一,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忽视了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佩特曼看来,参与式民主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而且还可以实现工业体系的民主化。但在当代民主理论家看来,这一主张忽视了民主与自由之间潜在的冲突。萨托利曾明确指出,平等和自

由的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最佳的补充,也可以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②④}他认为追求经济平等或结果平等会使国家成为资本家式的所有者,会赋予国家以巨大的权力,会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造成一种真正可怕而又决定性的权力悬殊,这种悬殊使不服从国家权力的人无法生存。因而萨托利认为追求平等存在着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平等就会毁掉自由,也会毁掉自由民主制度。”^{②⑤}许多学者就此认为佩特曼关于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社会民主的主张断不可行,而且还带有乌托邦的色彩。第二,就佩特曼对参与性社会的论证所采用的依据来看,格拉斯哥的罗文工程有限公司只有20个人,它所实施的参与性民主对于当今一个庞大的社会来讲能有多少借鉴意义值得人们怀疑。就连佩特曼本人也对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这么一个小规模的案例而表示遗憾。另外,佩特曼认为前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组织形式从整体上看非常类似于一种参与性社会,因而为实施大规模工业民主提供了唯一的例证。批评者们质疑佩特曼的这一看法,因为南斯拉夫政权已经瓦解,建立在工业民主基础上的参与性社会已经远离现实了。不仅如此,当今学术界对前南斯拉夫的工人

自治的管理制度本身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是一种民粹主义政治因而缺乏效能和凝聚力,加之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无法找到大规模工业民主的实际例证,更不用说实现工业领域的民主向整个政治领域的扩展,如此看来,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注:

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米歇尔·克罗齐、绵贯让治、塞缪尔·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卡洛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3、12—13、40、39、39、40、103、89、92、103—104、3、5、7、12页。

佩特曼所说的“当代民主理论”实际上就是当代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①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5、415页。

②①②③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342、342页。

②④⑤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367页。

(责任编辑:宁 岩)

The Revival and the Plight of Classical Ideals of Democracy: On Carole Pateman's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theory

Chen Binghui & Li Pe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Democracy, Carol Pateman proposed 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Theory aimed at the revival of the classical ideas of democracy. In order to achieve a fully democratic and participatory society, she asked to broaden participation and emphasized expansion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from the political field to the economic area. However, this idea faces a lot of difficulties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Key words: pateman;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liberal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